

· 科技伦理治理教育专题 ·

[编者按]202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为此,中国自然辩证法各分支机构联合国内相关学术机构迅速开展了多种不同形式的学术活动,形成近期学术热潮。其中,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与社会发展专业委员会联合西北工业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于2022年3月31日和2022年5月14日举办了“新时代科技伦理教育的现状与未来”为主题的论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教育与普及工作委员会于2022年7月15日通过线上方式召开了“科技伦理治理课程建设与教学学术研讨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暨科技风险治理与人类安全专业委员会于2022年9月3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了“当前科技重大风险的伦理治理”学术研讨会。本专题即是从上述活动中选刊的一组论文。本刊近期还会持续关注该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并期待有更好的成果奉献给读者(详见封三《“科技伦理前沿谈”征文通知》)。

文章编号:1000-8934(2022)11-0003-08

DOI:10.19484/j.cnki.1000-8934.2022.11.001

科技异化新常态下伦理治理的新精神

王天民,高润竹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科技活动的“唯新”价值取向,加之于资本“逐利”的驱动作用、政治对抗的助推效应,科技异化问题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尤为凸显,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科技异化的波及范围与科技应用的领域同步拓展,科技异化深入到与资本合谋合流的内在层面,正在引发“模糊人与物的区别”、“终结人类未来憧憬”的复杂影响。以伦理治理为对策,遏制科技异化及其导致的严重危机和风险,必须立足人类文明“伦理转向”新精神,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天地参”的实践智慧,遵循自然而然“赞天地化育”的自然之道,积极构建全球联动、惠及各方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科技异化;伦理治理;文明转向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科技发展及其应用之于人类生存具有双重效应,是学界由来已久的基本共识,正是由于此种原因,人们认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然而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科技界频繁爆出的重大突破和发现,让世人一次甚于一次地惊愕和震撼。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带给人类的隐忧和恐惧显然淹没了它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欣喜,益愈凸显出异化与灾殃之端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¹⁾,人类是时候在科技观念、科技发展及应用模式等方面做出冷静思考和深刻反省了!从科技活动的源头来看,科技是人类的发明,内蕴着人类的价值诉求,同时也是人文精神的彰显方式,科技与人文内在地具有“人本”

同根性;从科技发展的内在机理来看,科技活动及科技应用的良性运行,必须遵循人与自然界共有的融物理与伦理一体的天然之道,科技活动与人伦生活具有实践同源性。然而,近代以来人类的科技观和科技应用模式,乃是基于西方“主客二分”“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加之于资本逻辑和政治对抗的驱动,科技异化及其带来的各种风险自然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本立而道生”⁽²⁾¹⁸,立足科技的本来规定性,特别是科技与人文的“人本”同根性,科技与伦理的实践同源性,审慎地思考科技异化的新常态及其深层根源,明确科技治理的新精神,对于从根本上把脉和诊治当代科技异化问题具

收稿日期:2022-8-29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及当代创新研究”(20&ZD043)。

作者简介:王天民(1970—),山东汶上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与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传统文化;高润竹(1998—),女,河北沧县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有重大深远意义。

一、科技异化加剧的内在根源

科技是人类文明的阶梯,科技发展对人类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这只是科技与人类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科技发展除了对人类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外,还可能给人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一方面是由科技自身属性的辩证统一性即善恶统一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人类运用科技的方式和限度所决定的。随着人类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当前人类科技已跃迁至由信息化、智能化和基因编辑技术所标示的“超常”时代,人类生活对科技的依赖已进入“以技术为座架”的超常状态,由科技的辩证属性和双面效应所决定的科技异化问题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剧和高风险状态。当前科技异化加剧,是科技自身的“唯新”取向、资本逐利本性、政治对抗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综合效应,理清当前时代科技异化问题的内在诱因,是从根本上诊治科技异化、规避科技风险问题的“清源”之思、治本之策。

1. 科技“唯新”加速科技异化

创新是当代社会最富“正能量”的鲜亮概念,国内国外、上上下下都在强调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创新。相对于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创新,创新之于科技发展更具内在性或本位性,科技的本性和命脉就在于创新,科技的存在和发展完全依赖于创新,科技是以创新的方式存在的,可以说“唯新”是科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从科技的起源来看,科技具有“属人”性,人类求知的天性决定了科技的产生和永无止境地突破与发展。这一点在现代科学家的“抑制不住”的探索精神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某著名科学家曾把科学家的研究探索与玩游戏“闯关”“打怪”相类比,认为科学家在不断创新的研究探索中自得其乐,甚至会“上瘾”“中邪”无力自拔。另一方面,从社会实践来看,科技之于生产生活的突出功能和效用,必然会使人类产生强烈的技术需要,必然会积极地推动技术创新。正如马克思所言“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³⁾¹⁵⁹

在人的求知欲和生产生活需要的推动下,近代

以来科技发展一直保持着加速度强劲势头,从18世纪的蒸汽时代到19世纪的电气化时代,从20世纪的信息时代到21世纪的智能时代,科技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科技创新一次比一次迅猛,科技向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转换的速度一次比一次加快。“新技术从发明到应用的时间大为缩短。蒸汽机从发明到应用为84年、电动机为65年、无线电为35年、雷达为15年;而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技术则多在10年以内,例如原子能利用为6年、电子计算机为5年、晶体管为4年、激光器仅为1年。”⁽⁴⁾我们正在经历的智能时代在“产-学-研”一体化理念支配下,知识探索、技术研发和实践应用之间似乎不再存有时间间隔,许多专业领域科技创新即意味着实践突破。科技创新无止境地迅猛突破、科技创新与生产生活实践无间隔甚至共时性地推进,必然造成科技异化甚至风险前所未有地加剧,因为这其间弱化甚至略去了技术应用前的风险评估和善恶省思,是一种无所顾忌、铤而走险的痴迷和沉醉。这种痴迷和沉醉是科技“唯新”精神的充分确证,更是科技“唯新”精神加速科技异化的突出症候。

2. 资本逐利驱动科技异化

科技异化是在科技应用过程中发生的。人类应用科学技术的基本方式是应用科学技术制造出具有相应科技含量的生产生活工具或消耗品,主要动机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节省或替代人的体力或脑力支出,获得生产和生活的便利,二是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或货币财富回报。出于这两种动机的科技应用都可能导致科技异化问题的产生,前者会因为人对高科技产品的过度依赖而导致异化,后者会因为人对经济利益的贪欲而导致异化。这种情形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商品二重性理论能够得到更清晰的阐释。商品本身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属性,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会由于过度追求商品的价值,而努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快科技的生产应用,商品购买者和消费者会由于过度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努力购买使用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二者动机虽有区别,但是共同助推了科技创新和生产应用,共同加速科技异化的结果。

科技内蕴的双重属性、科技应用必然衍生的双重效应,决定了在相对欠发展的前现代社会,科技及其应用也会有异化问题产生,中国古人认为“智慧出,有大伪”⁽⁵⁾⁷⁰,把技术蔑称为“技巧淫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指认。但是,由于

前现代社会科技总体上还不够发达,科技应用程度比较有限,特别是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模式,从根本上决定了前现代社会科技异化问题并不严重。然而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以后,由于资本逻辑的整体驱动作用,科技应用的程度和速度空前提高,由之所导致的科技异化问题也空前严重了,这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揭露。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趋利本性,决定了它是无孔不入、无所不用的,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资本利润的科学技术自然会成为资本家狂热追捧和利用的因素。正是由于此种原因,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社会以后,科技研发和应用速度较之于前现代社会“如同获得魔力一般”地加快,而由之造成的异化也异乎寻常地突出和严重,直接体现为“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³⁾⁵³。

3. 政治对抗助推科技异化

进入机器大工业的现代社会以后,人类历史开启了“世界历史”模式新篇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接触和相互影响日益频繁和深入,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也日益激烈和严重。不可否认,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合作甚至友好互助关系,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世界乃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主题,当今世界就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但是,即使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时期,国际间的竞争和对抗也从未停止过,明争暗斗、暗流涌动、地区冲突不断、局部战争频发仍是和平与发展主题下国际局势的常态状况,和平与发展乃是竞争与对抗整体格局下的相互制衡。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抗的根源和实质是经济利益的竞争,对抗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政治对抗,即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国家政权为主体致力于维护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方式的自主性,同时积极维护本国在其他国家的权益和利益。在频繁的国际交往和激烈竞争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会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强化自身“综合国力”,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其中科技水平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政治对抗作为由政府主导的国际竞争的基本模式,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对抗乃至战争,从欧洲现代化起步阶段的海外殖民与扩张,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无一不是体现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无一不是把科技竞争推向新的高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以和

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发展阶段,后经三十多年国际局势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世界大国之间综合国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快速崛起,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其间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相继出现、迅猛发展,全球化潮流浩荡推进,世界日益成为各国交往频繁和便捷的“地球村”。国家和地区休戚相关的密切交往,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国际格局的重大改变,极大地强化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机遇观念和竞争意识,而竞争的焦点和核心依然是前沿科学技术的竞争,竞争的直接影响和后果便是各国进一步加快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特别是对经济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的产业技术和在国防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尖端军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总之,世界范围的激烈竞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同国家和政府的强力政治对抗,极大地加快了科技研发与应用的速度,助推着科技异化不断加剧和攀升。

二、科技异化的新常态

随着全球化潮流的加快、国际竞争的加剧、人类对高科技依赖的加强,科技研发应用前所未有地加快,由之所导致的科技异化问题在作用范围、深度和复杂程度等方面呈现新的态势,科技异化引发的发展危机和风险更加切近和严峻。

1. 科技异化范围更广

科技的双面性和科技应用的双重效应,决定了科技异化的波及范围与科技手段的应用范围具有同构性。近代以来历经数次技术革命,前沿科技已演进到智能技术时代,人类科技手段呈现出多层面梯级结构体系,各个层级类别的技术手段被全面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科技异化的波及范围与之同步全面发生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往人们谈到科技异化的问题,首先被提及的是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时至今日,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科技异化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较之以往更加严重。经济领域的科技异化,表现为生产环节人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人自身的退化;消费环节经销商利用高科技广告手段“制造时尚”,引导奢侈、畸形消费,扭曲人的心态;人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利用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模式下,资本逻辑对科技因素的挟裹,不但会在上述多

个维度加深资本异化,而且会使科技异化集中表现为个体发展的片面化和人际关系的对立化。军事领域的科技异化,是最为直接和显著的异化,从两次世界大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和使用,到美苏争霸时期星球大战的威胁,再到当前尤为严峻的核战争及生化武器风险,无时不使人类深切忧戚科技异化的险恶后果。

在智能化科技革命勃兴的当代社会,科技异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传统领域继续蔓延,还随着高科技应用范围的拓展,延伸至政治、文化等精神生活领域。科技异化在政治领域的表现,一是体现在政权机构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驾驭高科技设施,加强对社会成员行动与思想管控,“制造信息茧房”,压缩其自由生活空间;二是充分利用科技设施与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使社会成员使用和消费科技设施与产品的过程中被政治意识形态“俘获”和“教化”,成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⁶⁾屈从的“单向度的人”。科技异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首先体现在以信息技术为基底的网络虚拟文化对现实生活文化的干扰、冲击甚至取代。魔幻的网络用语、另类的网络文学、大放厥词的网络大V稀释着人类文化的渊博历史底蕴,消解着人类文化的厚重理论根基,搅扰着人类文化的精神清泉,在喧嚣中藏纳着碎片化、表浅化、混沌化的网络时代的文化观念。此外,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高智能机器人加快升级更新,在“知、情、意”等多个方面不断接近着人类,关于人类的本质、起源与归宿等传统观念正在遭遇严峻挑战,人的自我认证正在被颠覆,以人的自我认证为核心的一切文明和文化观念正面临被彻底消解的危险,这是科技异化在文化领域最可怕的后果。

2. 科技异化程度更深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异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人类科技水平经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逐步革新演历的过程,科技异化也呈现出由微到显、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逐步增强的态势。在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科技及其应用突出体现了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征服改造自然能力的强化、人类自由自主性的增加。正是由于具备了蒸汽和电气科技应用能力,人类才摆脱了对强大自然力的盲目崇拜和蒙昧认知,转而理性地审视周围的世界,确立起“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⁷⁾的信心;正是由于具

备了蒸汽和电气科技应用能力,才极大地增强了人自身的生产创造能力,使大片辽阔洪荒的自在世界变成了被人类开发的人为世界,并使人类从中发掘出源源不断的宝贵资源;正是由于具备了蒸汽和电气科技应用能力,才使人类从各行业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前所未有地丰富了人们的闲暇时光,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自我的机会和条件。总之,在蒸汽、电气等人类科技的初始发展阶段,科技的良善属性是其基本属性,科技应用的积极效应是其主要功效。虽然蒸汽技术、电气技术等人类初始科技及其应用,也产生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但是相对于它对人类理性的启蒙作用、它带给人类的财富、便利与自由,它在当时社会无疑是一种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虽然蒸汽、电气等人类初始科技手段也由于被资本主义体制运用、被资本逻辑挟裹给劳动者乃至全部社会生活造成了异化,但是异化的祸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科学技术,科技本身是导致革命进步的因素。

我们所处的信息技术强劲发展、智能技术方兴未艾的时代,较之于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科技异化显著加深。其一,由于高科技设施的广泛使用,造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并由之引发了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恶劣后果,而且这些后果相对于科技带给人的财富、便利和舒适渐趋凸显为更主要的方面。其二,不同国家竞相将尖端科技运用于军事装备,相互间的毁灭性威胁不断攀升,人类整体面临的毁灭性风险与日俱增。其三,科技趋于资本化,科技与资本合流导致的异化相对于科技与资本的合谋导致的异化更加严重和深入。正如有学者针对大数据时代的隐私经济的批判所指出的,“所有网络的用户,所有处于这个社会的自由人,都被纳入到资本主义数据工厂社会的生产体系之中,成为数据原材料,从而被监控和剥削。”⁽⁸⁾¹³科技与资本的合谋导致的异化似乎通过变革社会经济基础、取消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可以避免或取消,而科技与资本的合流使科技与资本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科技资本化,在此情形下,科技的善恶二重性被“单一的”资本恶性所取代,科技及其应用导致的异化已经无法通过科技与资本的剥离来消除了。其四,科技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利用,不但在显性层面上科技手段和技术设施普遍被用于政治控制与社会治理,而且在隐性层面上科技以提供物质文化用品和便利舒适生

活的方式对人进行着观念形塑和精神控制,全面弱化了人的主体意识和批判能力。总之,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科技异化是历史恶果与当下风险的汇聚、是潜隐于经济政治活动中的深层顽疾。

3. 科技异化影响更复杂

科技异化的普遍化和深层化,对当前时代乃至人类未来具有重大复杂影响。科技异化背景下个体生活意义、社会公平正义、人类文明前景等各层面遭遇到一系列复杂问题。就人类来讲,生活的意义、幸福、尊严等一切重大基本问题都与人类作为万物之精灵的“类的”独有性、个体的特殊性以及人类对其“类的独有性”“个体特殊性”的领悟和认证有关。当其明确了“人是什么”,对人性或人的本质有了明确的界定,明确了“我是谁”,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与定位,他才能追求和获得他所要的生活,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幸福与尊严。个体有了“知、情、意”综合性的人性认知,使其能够在追求真知、体会真情、坚守意志中赢获深刻、饱满而崇高的人生;当其明确了人生的短暂、个体能力的局限时,才可能在自律与他律统一中立自主之命、守敬畏之心,于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活出无限的生命意义。然而,科技异化之于人类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导致了人的“类性”和“个体特殊性”认证的困惑,当智能人具备了“知、情、意”成为了人,人将面临被取代的存在危机;当智能人超越了“人性的有限性”成为强势的能够驾驭人的“另类生命”时,人的生命尊严将何在?!即使人不被取代、不被驾驭,人能够用全能的“智能技术”装备自我,从而成为“超越有限性”的全能人,生命也会因为“张力”的消失和“恶无限”的延续而失去意义。

信息智能时代,科技异化的复杂影响同样会在社会公共生活以及人类未来发展方面体现出来。承认个体先天自然差异性,鼓励个体通过后天努力提升社会地位,借助于社会协调与分配,把个体差异控制在合理限度内,确保个体普遍有尊严地生活,是现代社会营造公正性公共生活的基本路径。然而处于经济、政治优势地位的阶层对基因技术、智能技术的优先亦或垄断使用,会在个体先天自然差异的基础上,加增个体间源于技术应用的差异,而且后者会发挥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以至于给那些试图通过后天努力提高社会地位的个体造成更大困难和压力,社会阶层差异会进一步加大和固化,甚至会使固化的阶层差异向下一代传递,从而使促进个体阶层流变、推进社会公正的愿景变得更

加渺茫。超越资本逻辑,消除剩余价值剥削,是人类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体制,跃迁至新的更高文明形态的决定性环节。然而信息智能时代,资本与科技“合谋”升级为资本与信息“合流”的背景下,社会成员不可避免地置身信息网络空间,不自觉地“生产”信息,信息作为剩余价值以更隐蔽的形式被信息平台无偿占有——“数据和媒介平台通过对个人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和分析,将其生产为预测产品,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资本逻辑是数据和媒介平台广泛采集个人隐私数据的基本动力,大数据技术为隐私经济提供了技术支撑”⁽⁸⁾¹⁴,资本的多样化、资本与科技一体化、资本逻辑作用方式的隐蔽化,加大了超越资本逻辑的困难,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跨越更多障碍。

三、科技异化伦理治理的新精神

面对信息智能时代科技异化日益普遍深入的严峻态势,人类必须做出及时而积极的应对。伦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体现了人类的意识自觉和行为自律,是应对科技异化的重要依托。围绕强化科技异化伦理治理,学界从精神理念、行为规范、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如“负责任创新”⁽⁹⁾理念、确立行业规范、划定科研禁区等。审视科技异化伦理治理相关思想见解和对策措施,进一步强化科技异化伦理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对策,必须立足人类文明“伦理转向”大视野,把准科技前沿主要风险,强化现代文明治理手段。

1. 立足人类文明伦理转向大视野

当代科技异化的严峻态势,并非仅仅是当代人的罪责,而是人类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果。立足“大历史观”或人类文明发展整体脉络,才能透辟地把握科技异化的总体性根源,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科技异化的蔓延泛滥。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因素是人与物,“人不同于物,故人理不同于物理,而称之为‘伦理’。”⁽¹⁰⁾¹“物理”和“伦理”是支配人类历史发展的两种基本规律。物理作为自然规律或自然之道亦是天然之道,又可以称为“天道”,它是自然界或自然物互动转化所遵循和体现出的基本规律,在没有人为了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自然界或自然物循其自然之道互动和演化。伦理是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亦可以称为

“人道”。人生活在物质世界,必然会与自然界和自然物发生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观念中,“人道”与“天道”是同根同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⁵⁾⁹⁵人道是证成或彰显天道的基本方式。因此,人与人之间以自然界或自然物为中介进行互动交往,虽然对“物”有沾染,对“物理”有因应,却不会对“物”有伤害,也不会对“物理”有悖逆。相反却能够达到“人”“物”各得其性、相辅相成的理想境界,正所谓“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²⁾³³⁵

科技活动,作为人探寻和应用自然之理(物理),引发或促成自然(物)之变,从而满足人之所欲的活动,作为人的活动必须遵循“人道”,作为自然(物)之变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之道”或“天道”。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人道与天道同源”、“人与物相成”的实践理念,科技的发展既不会伤人,也不会害物,而是人与物并育不害、并行不悖,根本就不会导致所谓的异化。然而现代科技发展观念和基本模式起源于西方,体现和遵循的是西方的世界观和发展观,而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发展观。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西方的世界观强调的不是人与物精神同源性,即人与万物共同根源于化生万物的生命本体亦即天然之道,而是强调人的中心地位;相较于中华传统文化人与物各尽其性、相辅相成的实践观,西方的实践观更强调人对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征服和驾驭。西方的这种世界观和实践观体现了突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属性,在其支配下,人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征服驾驭世界的需要,必然无限地片面化追求科技的发展,必然会陷于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科技狂热中不能自拔。与之相对,对人自身行为的省思、伦理约束以及精神世界的营造必然被冷落和忽视。正如黑格尔所言“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¹¹⁾总之,科技异化的产生和加剧,源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及由之所决定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的发展观念和文明样式。从根本上遏制科技异化,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人道天道同源”宇宙观汲取思想资源,在发展观念上实现由科学主义向“伦理主义”转变,在发展模式上实现由“物质文明”向“伦理文明”转变,即“由外向的扩张向内敛的收敛、由外延的扩大向内涵的丰富、由外在的自由

向内在的自律转变。”⁽¹²⁾

2. 遵循自然而然之道

任何事物、事件和活动都有其自然之性或本然之性,海德格尔称之为“本己”⁽¹³⁾性,事物、事件和活动按照其自然之性而存在和发展,作为“自然而然”的存在和发展,不会偏离或背反于其“本己性”,因而也就不会发生“异化”。异化则意味着事物、事件和活动违背了其本然的“自然而然之道”,偏离或背离了其“本己性”。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异化也就意味着科技的存在方式即其发展和应用背离了“本己性”和“自然而然之道”,从而也引起活动主体(人)、应用对象(物)及其相互关系(科技-人-物)背离了其“本己性”和“自然之道”。扬弃或救治科技异化,就要在明确和恢复科技活动的“本己性”、“自然而然之道”的基础上,明确和恢复科技活动主体(人)、应用对象(物)及其相互关系(科技-人-物)的“本己性”和“自然而然之道”。“道生万物”、人与物同源,决定了科技活动的“本己性”是人“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活动,即人参与“物之化生”、“物之尽性”的活动,即参与“物之生成形塑”、“物之潜能实现和功效发挥”。在此过程中人是完全顺应“物性”,即“尽物之性”的,因而是无私心或功利之心的,而是以天地善利万物之心为心,以“物心”为“己心”。人“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虽无功利私心,但是“物尽其性”所成就的性能却具有“利人”的功效,从而整体体现了人因“能尽之物性”,而“能尽人之性”的相互成就。

与“本己”的科技活动“能尽物之性”且“能尽人之性”、利物利人的相互成就性相对,异化的科技活动却因其悖逆物性与人性,导致了害物害人的恶劣后果。救治科技异化的悖谬性,必须尊从“物”与“人”的本己之性,顺应“物”与“人”生成化育的“自然而然之道”。在科技观上要确立“人与物同源”、“科技与人文同根”前提性理念,针对当前科技异化严峻的客观情势,要把人类发展的重心由开发“物性”、突出“物理”的角度,转换到提升“人性”、强化“伦理”的角度,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化育为主题”的实践智慧,采取有力措施限制、约束和规范高风险科技研发,提升科技人员职业人文修养和道德境界,切实保障科技活动严格践行科技发展伦理,充分彰显科技活动“能尽物之性且能尽人之性”、科技与人文同步繁荣伦理精神,坚决抵制褫夺物性、僭越人性的高风险智能技术和基因编辑技

术;积极倡导善利万物“长而不宰”⁽⁵⁾³⁶的“天地之心”坚决抵制急功近利、害物害人的“私心”,强力遏制科技资本化、科技与资本合谋合流的恶劣倾向;大力倡导“道器不离”科技工作伦理风范,提升“格物-致知-意诚-心正”、“心正-意诚-知至-物格”双向汇通科技行业道德精神,建树“由‘向外的对物的认识’到‘向内的自我觉识’,再到‘向外的实践开显’”⁽¹⁴⁾的科技伦理提升逻辑。

3. 建树命运共同体精神

科技异化的后果和突出特点是人与人、人与物普遍的对立,科技异化伦理治理必须变革和消解人与人、人与物的对立,构建和强化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解。伦理作为“人际关系的事实与规律及人际关系应该如何的内在道德法则”⁽¹⁰⁾²,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是“普遍化”的“以人为目的”道德意志的外在呈现。正如康德所要求的,“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¹⁵⁾“唯有这些准则的那个单纯形式,即它们据以适合于普遍立法的形式,才使它们独立地成为了实践的法则。”⁽¹⁶⁾科技异化导致人与人、人与物的普遍对立,症结就在于违背了“普遍化”的“以人为目的”的伦理要求,一部分人借助经济、技术优势,有时还借助于政治的优势或是这几方面优势的综合,把自己同其他人区别开来,甚至以自身为目的,以他人手段,优先使用先进科技手段装备自己甚至改良自己及后代的器官或生命基因,从而使自己在人际交往特别是竞争中获得优势。这种有悖于伦理要求的做法显然具有突出的消极影响和恶劣后果。一旦这种借助于科技手段“优化”自我的做法普遍化,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人在技术层面竞争的惨烈化,甚至会陷入丛林法则似的普遍伤害。以科技为装备手段的人与人的竞争往往是以自然界或自然物为对象或中介进行的竞争,其对自然界或自然物同样具有严重危害。“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³⁾⁵⁵人类竞争对自然界、自然物的危害,最终还是要有人类来背负。

对症下药是解决问题的高效便捷的理路。针对科技发展违背伦理要求导致的人与人、人与物普遍对立的异化状况,高扬“普遍化”的“以人为目的”的伦理精神尤为重要。“普遍化”的“以人为目的”的伦理精神,作为对每一个个体的普遍要求,其所导向的实践目标是“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不但与当代社会

诊治科技异化致力于达成的目标——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解完全一致,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憧憬的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³⁾⁴²²的社会理想目标一致,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胞物与”⁽¹⁷⁾的人生理想目标一致。面对科技异化加剧、发展风险严峻的时代状况,积极建树“命运共同体理念”尤为重要,而且“不像所有其他的社会组织的语汇(例如国家、民族、社会等),共同体似乎从来没有负面的意涵”⁽¹⁸⁾,它是人类凝聚共识、统一行动、化危为机、度过难关的根本行动纲领和全体动员。消弥人与人的对立,化解国家民族间的宿怨,营造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都需要相关各方以“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站位,彰显普遍的以人为目的的伦理情怀,人类才能逢凶化吉共克时艰。值得欣慰的是,随着科技异化的加剧,世界各国学界、政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呼吁空前高涨,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行动纲领的活动和组织机构日益发挥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舞台上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践行“真正的共同体必须对所有成员的真实需求做出及时回应,并确保秩序与自主之间恰当的平衡”⁽¹⁹⁾的基本精神,一体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世界人民幸福梦,为务实解决科技异化问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

面对科技异化范围蔓延、程度加深及其与资本逻辑、意识形态斗争缠绕的复杂发展态势,伦理治理需要采取标本兼治的系统化应对策略,明确科学研究善恶兼蓄的双重属性、科技应用正负并存的可变效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天地参”的实践智慧,致力于破解科技与资本合谋、合流的时代难题,积极推进人类文明“伦理转向”境界提升,务实构建全球联动、惠及各方的命运共同体,人类才能化危为机,摆脱科技异化的困境,使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复归人本根基,高扬人文精神,践履天人合一“利而不害”之正道。

当然,世界上最大的距离是思想和行动的距离,“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³⁾¹³⁴。卓有成效地治理和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遭逢的科技异化及风险问题,除了在思想上进行正本清源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上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把科技异化及风险的伦理治理与各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治理和社

会管理结合起来,与国际范围内生态环境治理乃至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协调合作治理结合起来。唯有如此,全人类才能共有—个美好世界,共同免于科技异化的灾难,共同享有科技合理发展的福祉。在这方面中国率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积极的国际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方面全面贯彻实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方针,积极治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突出问题,专门制定实施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指导科研活动,惩治违规违法科研人员;另—方面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率先向全世界宣示碳达峰时间进度与方案,努力推动国际科技伦理治理合作和高风险军事技术管控。面向未来,各国人民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国际担当,积极践行新科技发展观,加强科技治理国际合作,—定能够开创文明安全美好的新未来。

参考文献

- (1) 孟子[M]. 方勇,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32.
- (2) 论语·大学·中庸[M]. 陈晓芬,徐儒宗,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上海技术交易所. 上技所总裁颜明峰亮相《头脑风暴》与众专家破题“基础科研及科技成果转化低效之困”[EB/OL]. [2021-04-13](2022-08-28). <http://www.stte.com/articles/217>.
- (5) 老子[M]. 汤漳平,王朝华,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6) [美]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27.
- (7) [苏]列宁. 列宁全集(第5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83.
- (8) 武青,陈红兵. 大数据时代的隐私经济及其批判[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2): 8-14.
- (9) Burget M, Bardone E, Pedaste M. Definitions and Conceptual Dimensions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7, 23(1): 1.
- (10) 王天民. 人的自我创造: 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旨趣[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11) 胡志毅编著. 中外经典演讲选读[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 114.
- (12) 刘啸霆. 文明危机与第二开端的哲学[J]. 理论探讨, 2021(6): 106.
- (13)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82.
- (14) 王天民. 儒学认知伦理与当代科学观念的创新[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 32(12): 70.
- (15) [德]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81.
- (16) [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32.
- (17) 张文治编. 国学治要: 全3册[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1035.
- (18) [英]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27.
- (19) Etzioni A. The Responsive Community: A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1): 1.

The New Spirit of Ethical Governan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WANG Tian - min , GAO Jian - zhu

(School of Marxism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today's era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and it has shown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he "quest for originally" value orient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the driving effect of capital, which takes profit as the essence, and the boosting effect of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The scop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is simultaneously expanding with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The alie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integrated into the inner level of capital, which is triggering the complex impact of "blur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and things" and "ending the vision of the future of mankind". Taking ethical governance as a countermeasure to curb the alie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erious crises and risks caused by it, we must base ourselves on the new spirit of "ethical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We should absorb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 be juxtaposed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follow the natural way of "transforming and nourishing powers of Heaven and Earth". By doing so, we will be able to build an interconnected glob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at benefits all.

Key words: the alie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al governance; civilization turn

(本文责任编辑: 董春雨 赵月刚)